

“后革命时代”的中东格局

田文林

【内容提要】 2011 年中东剧变使地区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中东转型国家内部变革进程更趋复杂, 结构性难题日趋凸显; 地区力量日趋失衡, 地区力量格局呈现“无极化”态势; 中东剧变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新的困境。长远看, 中东格局仍在转型之中。

【关键词】 中东剧变 政治转型 无极化

【作者介绍】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东问题研究。

始自 2011 年的中东剧变是中东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 且至今仍在发酵。这场剧变对中东冲击巨大, 使“后革命时代”的中东格局呈现若干新特征。

一、中东政治转型前景更加复杂

中东剧变使该地区盛行多年的威权政体风光不再, 不少国家政权崩溃(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或岌岌可危(如叙利亚)。中东政治进入破旧立新新阶段, 即便政局暂时平稳的国家也纷纷加大改革力度, 困扰中东国家发展的若干深层次问题凸显。

首先, 世俗与宗教势力间矛盾日趋尖锐。中东剧变后, 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相继开启民主转型进程, 但民主转型并未解决这些阿拉伯国家原有问题和矛盾, 反使这些国家潜在的“政治/社会撕裂”公开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的矛盾日趋凸显并不断加剧。中东世俗威权政体垮台后, 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成为最大赢家。在摩洛哥众议院 2011 年 11 月 25 日大选中, 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获得 395 个席位中的 107 席, 大大领先于其他各政党; 在突尼斯, 2011 年 12 月 14 日复兴党党魁杰巴利被选举为过渡政府总理; 在埃及, “自由与正义党”领导人穆尔西在 2012 年 6 月 24 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当选埃及新总统, 该国首次出现穆兄会掌权的情况。在利比亚, 2011 年 11 月

24 日成立过渡政府时, 领导人贾利勒公开表示利比亚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任何有违沙里亚法的法律都是非法和无效的。^① 在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实力最强大的“叙利亚自由军”中, 伊斯兰分子占据主导地位, 叙现政权一旦垮台, 该国同样可能出现伊斯兰势力掌权态势。^② 因此, 西方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已演变为“伊斯兰之年”,^③ “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觉醒”。^④

然而, 多数中东国家长期是世俗力量掌权, 政教分离观念深入人心。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中东舞台影响力上升以及政策伊斯兰化趋势, 引发世俗力量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弹, 世俗与宗教势力较量日趋成为中东政治生态中的新景象。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中东剧变的发源地, 但自本·阿里 2011 年 1 月下台以来, 该国政治经济瘫痪, 悲观情绪弥漫。因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分歧严重, 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和选举法进程屡屡受阻。2012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革命”爆发两周年时, 总统马尔祖基和议会

① Patrick Seal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http://www 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248703](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248703). (上网时间: 2012 年 12 月 20 日)

② M. R. Khan, “Political Islam, 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 *Air Power Journal*,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 121.

③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 11.

④ Michael A. Lange, “After the Arab Spring: Political Islam on the Rise?” *Kas International Reports*, April 2012.

议长杰法尔原定当天发表演说,却遭民众投掷石块而仓皇退场。在埃及,穆尔西为首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虽然初步掌握最高行政权力,但在军队、司法体系乃至主要行政机构中,仍是穆巴拉克时期原班人马,双方互不买账,围绕权力分配、人民议会合法性、宪法制定等问题明争暗斗,致使新宪法制定和议会选举长期处于悬置状态。2012 年 11 月 22 日,穆尔西发表新宪法声明,规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之前,埃及法院无权更改总统法令,并宣布解除总检察长职务。此举引发埃及司法界及众多反对派抗议,支持与反对穆尔西的民众同时上街游行示威,埃及出现自“一·二五革命”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长远看,中东转型国家世俗与宗教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将日趋公开化、常态化。这种内部纷争不仅严重迟滞政治重建进程,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本身面临危机。从世界范围看,1960 年以来,全球共有 103 个国家发生民主转型,其中 57 国成功转型,46 国出现停滞。阿拉伯世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推行民主的条件,^①由此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注定将漫长坎坷,甚至不排除产生“失败国家”的可能。

其次,摆脱经济困境成为主要难题。当初阿拉伯民众群起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因而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破旧立新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诉求。阿拉伯国家经济陷入困顿,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经济“去工业化”所致。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曾指出“贫困和大规模失业成了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正常结果。这些都为此次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②因此,要真正摆脱经济困境,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必须适当调整经济路线,重启“再工业化”战略。

然而,从目前看,阿拉伯转型国家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变革,前提是要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取代落后的统治阶级),唯有如此才可能更新落后发展思路,变革不合理生产关系。但阿拉伯剧变无论范围还是程度,都是一场不彻底的变革。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 6 个国家经历了大动荡,其中两个

国家(突尼斯与利比亚)原政权被推翻;另外两个国家(埃及和也门)领导人被罢黜,但原政权主要成分被保留下来;一个国家(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仍在拉锯;一个国家(巴林)的政治动荡已被镇压下去。^③即使那些变革最剧烈的国家,也未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掌权的革命。大众参与和民主选举看似使普通民众呼声得到关注,实际仍是西化或伊斯兰化的精英阶层得势,中下层民众及其政治主张仍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

这种变革的不彻底性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既不会变革生产关系,也无意或无力摆脱导致阿拉伯国家依附性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例如,突尼斯 2011 年 10 月大选实际是为右翼阵营上台清理道路——包括复兴党和自称为布尔吉巴主义者的政客,这些人之前都是本·阿里政权的追随者,这批势力支持西方“民主革命”,但也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突尼斯革命后,他们仅仅满足于批判警察镇压制度,以及对由总统家庭成员控制的所有“王室”产业征税,而没有挑战本·阿里时代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反而认为这种模式“有效”。公众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依附型发展模式导致了社会形势恶化,进而导致大规模起义的爆发。^④埃及也是如此。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文化中,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这些活动的本质,这些基本经济活动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⑤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中东剧变很难衍生出新的发展模式,更不可能使阿拉伯经济出现飞跃式发展。

相反,持续动荡使中东转型国家经济每况愈下,民生问题雪上加霜。例如,埃及自 2011 年以来经济

① 参见 Efraim Inbar,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midst Unrest in the Arab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2, p. 60.

② [埃] 萨米尔·阿明 “阿拉伯革命: 一年之后”, 《国外理论动态》, 2012 年, 第 7 期, 第 72 页。

③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 7.

④ [埃] 萨米尔·阿明 “阿拉伯革命: 一年之后”, 《国外理论动态》, 2012 年, 第 7 期, 第 72 页。

⑤ [埃] 萨米尔·阿明 “阿拉伯革命: 一年之后”, 《国外理论动态》, 2012 年, 第 7 期, 第 74 页。

增长率下降 2 个百分点,通胀率增加 20%,埃镑对美元贬值 10%,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一蹶不振。根据埃及财政部报告,到 2012 年 5-7 月,埃及预算赤字在 GDP 中的比重同比增长 8.8%,达 1365 亿埃镑。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埃及外汇储备从 360 亿美元降至 144 亿美元。^① 这种情况下,埃及不得不到处“化缘”,加重对西方国家及海湾富国经济依赖。穆尔西上台前,穆兄会一直反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但穆尔西上台后不得不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以期获得 40 亿美元贷款,由此使埃及当政者的实际政策与前政权的资本主义实践几乎没有区别。^② 这种状况使其更加依附发达国家经济体,经济重振短期无从谈起。

二、地区格局呈现“无极化”态势

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构成中东地缘版图的四大力量极。这些力量极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地区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大体运行平稳。然而中东剧变将该地区脆弱的政治生态打破,地区格局“权力碎片化”正使中东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极时代”。

首先,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整体下降。2011 年中东剧变又是典型的“阿拉伯剧变”,受到这场动荡冲击的基本都是阿拉伯国家,这表明阿拉伯世界内部弊端丛生(如经济落后、贫富分化、政治独裁等),已到无法自行调和的程度。由此使近几十年阿拉伯世界整体实力衰落之势更加明显。未来相当长时期,“动荡”与“转型”将是阿拉伯国家的主题词,由此使部分阿拉伯国家行为日益“内向化”,无暇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领头羊,但 2011 年政权更替后,埃及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经济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其在地区事务中一争雄长。埃及只能奉行模棱两可的模糊政策。^③

相较而言,海湾国家在中东剧变中“用钞票换平安”,花费约 1600 亿美元用于各种补贴,^④暂时躲过“政权更替潮”,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相对上升。目前,海湾国家经济实力可观。2000 年至 2012 年,整个中东年均收入增长为 3.5%,而海合会国家为 5%,卡塔尔达到 13%。海湾国家银行总储备达 10

万亿美元。经济优势使海湾国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日渐形成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目前,埃及 50% 的股票为海湾国家所有,约旦 75% 的股票为卡塔尔和阿联酋所拥有。^⑤ 实力凸显使海湾国家在当前中东事务中表现活跃,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政局演变处处可见海湾国家身影。然而,这些海湾君主国先天缺陷明显(军事实力孱弱、经济结构单一、政体落后、小国寡民等),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富而不强”,难以成为独挡一面的地区力量极。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落后,经济利益与西方捆绑密切,海湾国家当前外交重点就是与西方联手干涉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内政,卡塔尔还为叙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⑥ 但这种地区政策只会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和动荡,削弱阿拉伯世界影响力,因此海湾国家很难承担起带领阿拉伯世界走向复兴的重任。

其次,伊朗地区生存环境日趋恶劣。2011 年中东剧变初期,由于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亲美反伊国家,因而伊朗地区影响力更趋增强。然而,随着中东剧变向纵深发展,伊朗地缘环境转趋艰险。一是叙利亚危机使伊朗地缘优势得而复失。当初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改善了伊朗的外部生存环境,为伊朗实现“大国梦”营造出有利地缘环境。但当前叙利亚危机升级使伊朗这一地缘优势正在丧失。叙利亚危机持续时间越长,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就越是疏远。^⑦ 巴沙尔政权一旦垮台,叙利亚很可能出现逊尼派掌权前景,并可能投入西方和海湾国家怀抱,伊朗不仅将失去最重要的地区盟

① Niveen Wahish, “The IMF loan, encore”, *Al-Ahram Weekly*, No. 1112, August 30 - September 5, 2012.

② Khalil Al-Anani, “Islamist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l-Ahram Weekly*, No. 1112, August 30 - September 5, 2012.

③ L. Lavi, “Egypt’s Foreign Policy Under Muhammad Mursi: Trying to Please Everybody”,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Inquiry & Analysis Series Report*, No. 899, November 14, 2012.

④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 47.

⑤ Mehran Kamrava, “Middle East’s Changing Geopolitics”, <http://www.irdiplomacy.ir/en/page/1907946/Middle+East%E2%80%99s+Changing+Geopolitics.html>. (上网时间: 2012 年 12 月 15 日)

⑥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Geopolitics of Arab Turmoil”,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September 2012.

⑦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p. 40, 44.

友,其与真主党联系的纽带也会被切断,伊朗多年苦心经营获得的地缘政治优势将化为乌有。即使巴沙尔保住政权,其实力也将大为削弱。二是西方对伊朗制裁力度日趋加大。进入 2012 年后,西方对中东的关注重点由“阿拉伯之春”转向伊朗核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能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由此导致伊货币大幅贬值,石油出口明显下降,通货膨胀加剧,伊朗经济发展受损明显。目前,美国显然已将能源和金融制裁视为对付伊朗的主要法宝,未来可能继续加大制裁力度,由此使伊朗经济面临更严峻考验。三是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可能性增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 2012 年 9 月 22 日公开预言,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终将发生”。^① 分析认为,一旦以色列空袭伊朗,伊朗很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招致美国摧毁伊朗常规军事力量和基础设施。这将严重损害伊朗国力,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力也将丧失。^② 因此有分析认为,伊朗是除倒台的阿拉伯政权之外的第二大输家。^③ 伊朗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很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第三,以色列在中东更趋孤立。中东剧变前,因加沙救援船事件,以色列已经失去土耳其这一重要盟友。中东剧变再次使以色列成为失意者,地缘环境雪上加霜。一是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变数陡增。埃及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为数不多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埃以关系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基本前提。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后,埃及对以色列日渐疏远,出现了诸多动摇埃以关系根基的事件,如开放与加沙地带连接的拉法口岸,停止向以色列低价提供天然气,埃及民众冲击以色列驻埃使馆,部分人士质疑埃以和平协议的合法性等等。2012 年 6 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甚至公开拒绝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祝贺。一旦埃及对以色列彻底翻脸,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示范效应,使以色列重回腹背受敌的险恶处境。二是巴以力量对比朝有利于巴勒斯坦的方向发展。中东剧变后,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外部生存环境明显改善。阿拉伯新的当权者或幸存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诉求更加敏感和关注。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敢公开采取

敌视哈马斯、亲近以色列的政策。埃及穆兄会与哈马斯具有天然亲缘关系,“自由与正义党”显然更支持哈马斯,而不是法塔赫。哈马斯外部环境改善,打破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一枝独大”局面。2012 年 11 月 14 日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发生持续 8 天的军事冲突,以色列虽然仍占据军事优势,但哈马斯政治影响力陡增,以色列“封杀”哈马斯计划彻底破产。同时,巴解领导人阿巴斯不顾以色列阻拦,向联合国提交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申请,并于 11 月 29 日获得通过,使巴勒斯坦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巴以力量“再平衡”使以色列“一言堂”局面不复存在。三是伊核威胁使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两难。中东剧变以来,西方对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卡扎菲政权发动军事打击的教训,以及叙利亚危机可能导致伊朗失去一大地缘缓冲地带的担心,促使伊朗核立场更加坚定,并埋头加速推进其核计划。伊朗高官称,西方最严厉经济制裁未能动摇伊朗核立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012 年 9 月 16 日称,伊朗将在 6-7 个月后实现拥有制造核武器所需的 90% 的原料。10 月 8 日,美国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称,伊朗能够在 2 至 4 个月内生产出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武器级铀,并能在 10 个月造出核武器。伊朗议员也提出应给水面舰艇和潜艇提供核燃料,提炼 50% - 60% 的浓缩铀,这意味伊朗有意将核能力应用于军事目的。^④ 以色列面临来自伊核能力的安全威胁正在增大。由于美国无意对伊发动军事打击,拒绝为伊核计划设置“红线”,以色列面临要么冒险对伊朗单独动武,要么与有核伊朗共处的两难处境。以色列面临更多地区孤立、更多恐怖威胁以及伊朗核威胁前景^⑤,这

① “伊朗称以色列终将动手”,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23/c157278-19083299.html>。(上网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② Spengler, “All-out Middle East war as good as it gets”, *Asia Times Online*, September 18, 2012.

③ Policy Analysis Unit, “Arab Revolutions and Geostrategic Balances and Interactions”,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August 2012, p. 33.

④ A. Savyon, Y. Carmon, Y. Mansharof, “Tehran Declares Intent to Enrich Uranium to 90%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September 27, 2012.

⑤ Efraim Inbar,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midst Unrest in the Arab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2, p. 59.

使其无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第四,土耳其可能由中东剧变赢家变成输家。土耳其本来是此轮中东剧变的主要受益者。硬实力方面,土耳其相对于阿拉伯诸国的优势更趋明显;软实力方面,“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转型国家的吸引力增强;国际方面看,阿拉伯亲西方国家政局动荡,使土耳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性上升。^①但在优势明显情况下,土耳其一改此前“与邻国零问题”外交,转向在部分中东国家积极策动政权更替。埃及变局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是第一个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外国领导人;利比亚政治动荡后,土耳其虽不是最早介入,却对利比亚反对派支持力度甚大;叙利亚陷入动荡后,土耳其除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还扶植叙反对派,充当“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大本营,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各种支持。然而,土耳其在叙利亚推行“外交新政”不仅未能给自身国家利益带来多少好处,负面效应却日趋明显。叙利亚与土耳其互为邻国,叙利亚危机升级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土耳其首当其冲,其中对土耳其威胁最大的当属库尔德问题的凸显。

叙利亚危机升级后,巴沙尔放任东北部库尔德人自治。伊拉克库尔德区政府主席巴尔扎尼乘势插手,于 2012 年 7 月调停叙利亚库尔德两大派别实现联合,成立了“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军事上由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民主同盟党(PYD)主导。伊朗也与 2011 年夏天捕获的 PKK 重要领导人穆拉特·卡拉伊兰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并将其释放,鼓励他率领 PKK 进攻土耳其境内目标。库尔德族在土耳其境内人口最多、比率最高(20%左右),一直是土耳其最头疼的事。而当前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联手助推,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重趋活跃。如果叙境内库尔德人失控,很可能与土耳其库尔德人形成共振,使土耳其成为地缘格局重组的最大牺牲品。

此外,土耳其对叙利亚政局推波助澜,造成 50 多万叙利亚难民逃离本国,其中半数难民涌向土耳其,这使土耳其财政、治安面临巨大压力。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政策,还遭到国内 50 万阿拉维派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国民报》2012 年 9 月 19 日公

布的民调显示,逾八成土耳其民众要求政府放弃介入叙利亚。土耳其议员坦勒库卢认为,“我们在这场冲突中已被深深卡住,没有走出来的通道”。^②土耳其外交政策鲁莽激进,负面效应凸显,极大影响了土耳其在中东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由中东剧变大赢家变成大输家。

三、美国面临两难,谋求从中东收缩

美国是主导中东格局的最主要外部力量。中东剧变前,美国日趋加大战略东移步伐,其在中东明显呈现出战略收缩态势(如从伊拉克撤军、制定从阿富汗撤军战略、加大对地区盟友倚重力度等等)。然而,肇始于 2011 年的中东剧变明显打乱了美国的既定战略部署,迫使其不得不继续驻足中东^③。一方面,随着中东日趋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重组,地区国家对外防范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这为奥巴马政府重塑中东秩序提供了难得机遇,这种巨大诱惑促使美国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中东;另一方面,中东剧变中,众多亲西方政权根基动摇乃至政权垮台(尤其是埃及政权更替),使美国倚重地区盟友的传统政策日趋失灵,其不得不花大力气修补、调整已然失灵的中东政策。简言之,中东剧变产生的霸权诱惑与潜在威胁,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日趋加大对中东剧变的干涉力度。

具体说,这种干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尽量扶植亲西方势力,对中东亲西方国家视情况发展采取不同政策。对当权者权力基础暂时平稳的国家(如沙特、巴林等)尽量帮衬,对其镇压民众的举动视而不见(如沙特和阿联酋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民众抗议)。如果当权者大势已去(如埃及和也门),西方便转而支持抗议民众诉求,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诱

^①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 58.

^② 侯涛 “逾 8 成土耳其民众要求政府放弃介入叙利亚”,《环球时报》,2012 年 9 月 20 日。

^③ Dan Murphy, “Obama’s pivot to Asia? Middle East will still demand attention in 2013”,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31, 2012.

使这些国家继续沿着西方设定的轨道前进。^① 另一方面,对不听西方号令的“激进国家”,则不遗余力地鼓动和支持民众反抗政府,直至进行军事干涉。迄今,西方已通过武力干涉推翻卡扎菲政权,此后又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等方式,试图迫使巴沙尔政权下台。

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政治运动,但外部势力人为干预,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推行霸权主义,正在使中东剧变偏离既定方向。更重要的是,美国中东政策“再调整”并未完全消除旧问题,反而产生了一系列令美国头疼的新问题。首先是极端宗教势力加速蔓延。中东世俗政权(如利比亚和叙利亚)本来是镇压极端宗教势力的中坚力量,但西方国家的外部干涉,使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权力真空,从而为极端宗教势力蔓延提供了契机。叙利亚过去一直与恐怖主义绝缘,但自 2011 年陷入动荡后,国外宗教武装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叙利亚。“叙利亚自由军”中许多成员来自阿联酋、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乃至索马里和车臣等国家和地区。这些人有的隶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的效忠塔利班。这些极端分子参与叙境内反政府暴力活动、散播恐怖、制造教派冲突,使叙利亚日趋成为另一个“伊拉克”。利比亚情况类似。2011 年利比亚动荡前,该国主要圣战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原已销声匿迹,但该国政治动荡使其重趋活跃,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均是前极端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② 那些原本存在极端恐怖活动的国家,恐怖活动愈加泛滥。例如,在也门,中东剧变后“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乘机在该国扩张势力,占领南部多个城市。也门境内“基地”组织武装人员保守估计有 3000 人至 5000 人。中东极端宗教势力扩张,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是不言而喻的。当年正是“基地”组织制造了令人震惊的“9·11 事件”,并由此迫使美国发动消耗巨大的反恐战争。然而,当前美国对部分中东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使得“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势力获得新的喘息和发展机遇。“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扩展影响力的

“东进战略”,日趋被在非洲撒哈拉和马格里布等地区扩展影响的“南下战略”取代。

其次是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壮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在中东力推民主转型的“政治豪赌”,使政治伊斯兰势力成为最大受益者。由于政治伊斯兰的价值观与西方格格不入,双方交往历史充满敌对,因此,中东政治“伊斯兰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正日渐失去对中东局势的控制能力。2012 年 6 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新总统后,将中国而非美国作为阿拉伯世界之外首个出访的大国,表明新埃及推行旨在疏远美国的多元化外交政策。^③ 因此有美国智库学者质疑,美国是否“已失去埃及”。^④ 同时,伊斯兰势力上升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地区反美主义情绪更趋强烈。此前,奥巴马政府曾矢志改善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但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不降反升。2012 年 6 月美国皮尤调查显示,美国在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率都较 2008 年略低,而且越是美国援助力度较大的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越明显。79% 的埃及人不喜欢美国。2012 年 9 月,因美国上映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伊斯兰世界出现大规模反美抗议浪潮,尤其是 9 月 11 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遭袭身亡,更是令美国决策层无所适从。国务卿希拉里大惑不解“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感叹“我们迷失了方向”。^⑤

长远看,中东乱局很可能刺激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步伐。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重心呈现出“三级跳式”东转态势: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战略重心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并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侵蚀、消化因苏联解体而获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

① Niveen Wahish, “The IMF loan, encore”, *Al-Ahram Weekly*, No. 1112, August 30 - September 5, 2012.

② Zelin, “Jihadism's Foothold in Libya”,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12, 2012.

③ Chris Zambelis, “Egypt gains balance and leverage in China”, *Asia Time Online*, September 26, 2012.

④ Eric Trager, “Have We Lost Egypt?” *New Republic*, December 14, 2012.

⑤ Yoel Guzansky and Mark A. Heller Edited, “One Year of the Arab Sp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13, March 2012, p. 15.

果,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21 世纪头十年,在前苏联战果消化殆尽情况下,美国又借“9·11 事件”顺势将战略重心转向西亚北非,并在中东接连发动“反恐战争”,进行“民主改造”,试图将中东彻底纳入美国势力范围。截至目前,美国已通过伊拉克战争除掉了萨达姆政权,通过利比亚战争铲除了卡扎菲政权,通过叙利亚危机使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中东四大次区域(马格里布、利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中,美国已“降服”了三个。目前中东唯一能“绊住”美国手脚的伊朗,美国实际也已找到应对之道——日趋严厉的经济制裁。在中东战果渐趋消化、美国当前中东政策频频失灵、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势所必然。而西半球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使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和关切度下降,使其可以不必再按照确保中东及其油气资源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从而获得较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喘息机会。^①2012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开称,到 2020 年美国将把 60% 舰艇包括 6 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亚太地区。2012 年 11 月奥巴马再度当选总统后,

(接第 19 页) 球层面,在许多问题上两国都是共同利益和分歧并存;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挖掘合作潜力,扩大合作领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合作过程中增信释疑,在合作过程中调动积极因素,积累正能量,也就是“扶正祛邪”。

第二,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加强沟通。中美两国有许多利益是互相交汇的,重合的,但确有一些利益不是这样,有的利益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这些问题上两国就要通过商谈进行沟通、探讨、妥协、顺应,双方都会有所失,也都会有所得。中美之间现在有 90 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要珍惜这些机制,切切实实地用好,坦诚交换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西太平洋的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与海洋权益的争端,中美两国要谨慎对待,要避免利用国际场合突然发难,使对方猝不及防,导致矛盾升级;对于地区争端,两国应该更多地当消防员,切忌火上浇油;要

首次出访选择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亚太小国,其外交优先重点不言自明。很显然,美国如果在中东战略收缩,必然会引发其他外部大国以及地区强国的多层次权力博弈,使中东格局更加错综复杂(英法等欧洲列强首次主导利比亚战争,实际就是这种新动向的体现)。

迄今为止,中东转型仍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民主与专制、世俗与宗教、发展与倒退、霸权与反霸等不同力量、不同矛盾仍在持续发酵,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已成为中东牵涉面最广、最危险的地区新热点,并由此衍生出难民问题、教派冲突、库尔德问题等多个新的矛盾爆发点。一旦叙利亚现政权垮台,中东将面临新一轮地缘格局洗牌,中东局势将出现更多变数。○

(责任编辑:张浩)

^① 林利民“世界油气重心‘西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9 期,第 52 页。

避免隔空喊话,任由媒体夸大分歧,煽动民众情绪,甚至绑架了政策;两国在这一地区与第三国的联合行动,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关切,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

当然,增信释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两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产生了效果,就在这一点上增进了互信。在具体问题上的互信不断增进、积累,就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是一个长期、艰苦、锲而不舍的过程。过去中美两国已经这样做了四十年,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结束了,两国新领导人已经开始向对方释放善意,如最近习近平、李克强会晤卡特前总统,中美第 23 届商贸联委会的成功举行,奥巴马会见王岐山等。笔者相信,只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是可以增进合作,增强互信,逐渐朝着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前进的。○

(责任编辑:沈碧莲)